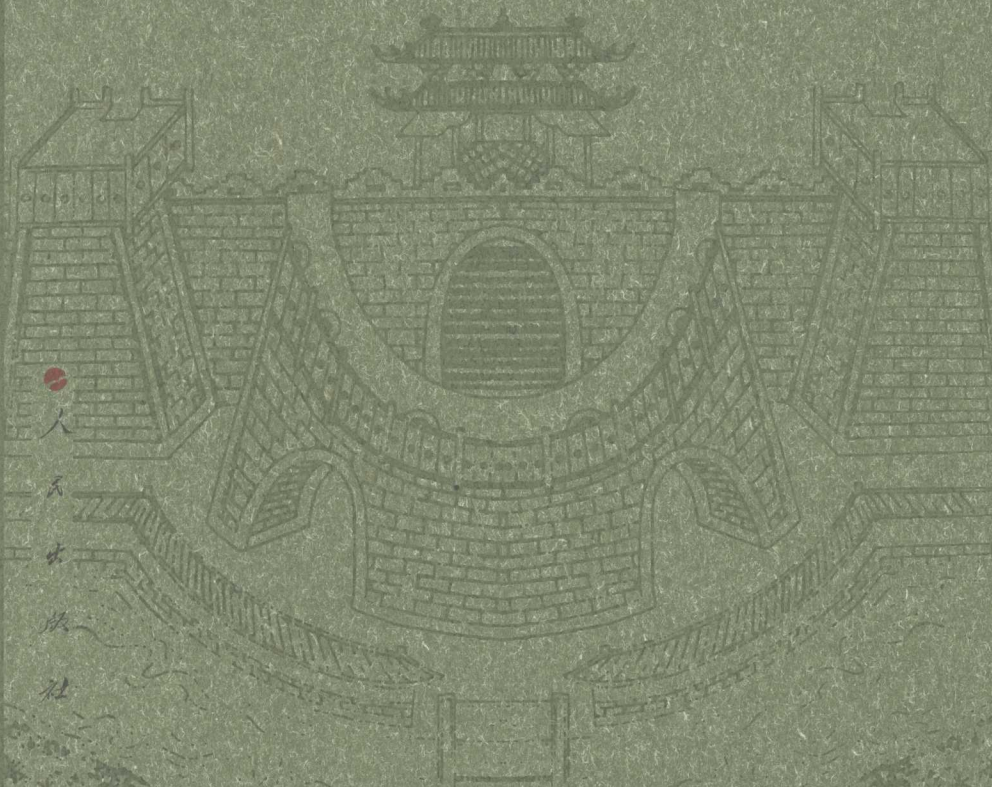


秦彦士◎著

古代防御军事 与墨家和平主义

——《墨子·备城门》综合研究

人民
出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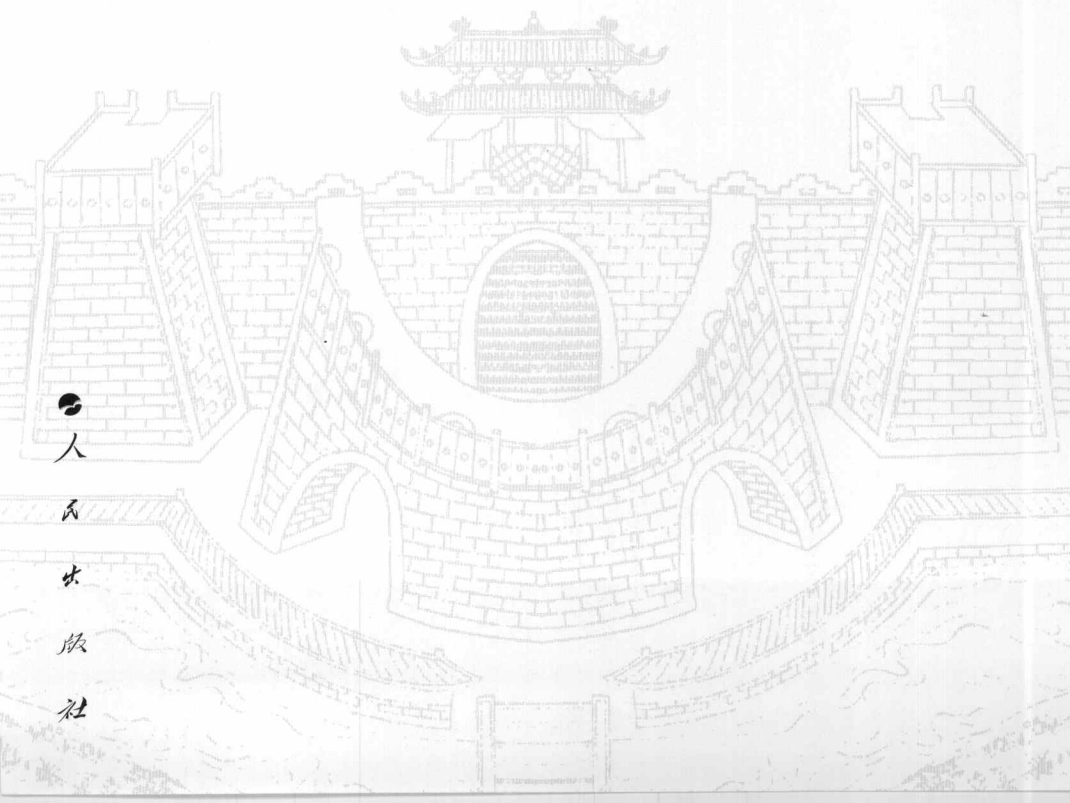


本书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

秦彦士◎著

古代防御军事 与墨家和平主义

——《墨子·备城门》综合研究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之美
装帧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防御军事与墨家和平主义——《墨子·备城门》综合研究/
秦彦士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

ISBN 978-7-01-006797-1

I. 古… II. 秦… III. 墨翟(前480~前420)-防御体系-
军事思想-研究 IV. E09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4887 号

古代防御军事与墨家和平主义

GUDAI FANGYU JUNSHI YU MOJIA HEPINGZHUYI

——《墨子·备城门》综合研究

秦彦士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6797-1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在中国学术史上《墨子》一书由于传本稀少以及研究者的缺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处于被冷落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巨变与学术思潮的转化,墨学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至今仍呈方兴未艾之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者的精力大多倾注于墨家的政治思想以及逻辑学,而对其城守军事学的丰富内容则罕有研究。自孙诒让《墨子间诂》以来,专著仅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一种,而真正的专题论文不足十种,致使相关研究一直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

自20世纪开始,随着一些相关文物的发现,一些学者就此作出了重要的考证与研究。早期有罗振玉、王国维先生的《流沙坠简》,当代有著名学者陈直、李学勤先生的突破性成果:如李学勤《云梦秦简与〈墨子·备城门〉诸篇》,陈直先生《〈墨子·备城门〉等篇与居延汉简》,以及初师宾的专著《汉边塞守御器考略》的相关研究。此外,军事史专家钟少异及学者孙中原、姜宝昌、徐希燕等也曾就一些问题做过探讨。然而,就总体情况而言,进一步全面的研究仍然十分缺乏。

相对于国内学界的忽视,海外学者则作出了更为显著的贡献:日本前有渡边卓《关于墨家守御的城邑》、《关于墨家的兵技巧书》等,后有田中谈的《〈墨子〉城守诸篇研究》等专题论文。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教授叶山(Robin Yates)更是作出了突出的贡

献：先有《攻守城器械与东周军事技术》（当时作者单位提名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后来扩充为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六分册：军事技术分册的大部分内容。

不过鉴于文本内容的残缺与文字的艰深脱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都存在诸多问题，而一些臆说更是随处可见，凡此种种皆极大阻碍了墨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然而相关研究成果毕竟能给予研究者以种种启示，因此这一领域的突破也就势所必然。

本人二十年来一直从事墨学研究，先后有多部专著及数十篇论文在大陆及海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而本书更是在著名古文学专家彭裕商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其成果受到李学勤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诸位学者的较高评价。本人的工作主要是在以下几方面对前人及时贤的研究有所推进：

一、充分利用《墨子》诸版本及其校注研究成果，对城守诸篇文本进行新的考校，从而纠正了孙诒让、岑仲勉诸人的一些失误。

二、据出土文献及其研究成果全面探讨墨家的守御技术战术，并考墨家兵技巧之特点及其影响。

三、据墨家防御军事学探讨古代和平主义之现代意义。诚如《中国科学技术史》所言：“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战争，但没有军国主义。”这一悠久历史传统的形成与墨家有深刻的联系：弱者怎样对抗强者的思想在中国军事思想上是一个主旋律，中国人基本上采用防御战略，这种战略创立的稳定的社会和军事体制，均与墨家思想有重大关系。

这既是对西方某些人的中国威胁论极好的反驳，同时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伟大思想资源。

目 录

序	(1)
一、《墨子·备城门》诸篇研究现状	(1)
二、《墨子·备城门》诸篇著者与时代考	(3)
三、《墨子·备城门》诸篇文本考校	(15)
四、《墨子·备城门》诸篇所载城制	(23)
(一)《墨子·备城门》各篇所载城制	(23)
(二)墨家城防设施、武器配备表	(29)
(三)墨家城守设施考	(33)
五、墨家十二攻守战具(战术)考	(38)
(一)临	(38)
(二)钩	(40)
(三)冲	(41)
(四)梯	(42)
(五)堙	(45)
(六)水	(46)
(七)突	(48)
(八)穴	(49)

(九)空洞	(51)
(十)蚁(蛾)傅	(52)
(十一)辘轳	(56)
(十二)轩车	(56)
六、出土文献与《墨子》城守诸篇考	(57)
七、《墨子》古字考	(85)
八、墨家兵技巧考	(87)
九、《墨子》城守的历史影响	(104)
(一)墨家城守诸器、战术在后世战争中的运用	(104)
(二)后世兵书所见《墨子》的影响	(110)
十、墨家军事学的地位与评价	(127)
十一、墨家和平主义的现代价值	(139)
附录	(153)
一、茅元仪《武备志》所录《墨子·备城门》 校记	(153)
二、孙诒让、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注释校补	(156)
三、墨家城守相关诸器械插图	(168)
参考文献	(198)
后记	(210)

一、《墨子·备城门》诸篇研究现状

作为“兵技巧”的墨家城守各篇，记载了大量墨子及其后学的城防军事战术、技术，其中许多攻守城技术早已失传，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由于其中的内容涉及中国古代不少科学技术知识的内容，以及有关军队编制作战技术（尤其是防御军事学）、墨家后学的活动方面的记载，因此是中国古代史料中极为珍贵的资料。著名学者岑仲勉先生认为“墨家这几篇书，我以为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做重要资料，两者不可偏废”。

然而，由于墨学在汉代既已成为绝学，后世学者极少关注，加之这一部分文字脱误、混杂极多，涉及的古代典章制度也极少可资参考的资料，故而研究难度极大。即使到近代墨学复兴以后，专注于这一部分内容的学者也极少，甚至不少人认为它没有多少价值。曹耀湘《墨子笺》即说：“《备城门》诸篇纵使文义定足，在今天实为已成刍狗。”甚至连胡适、梁启超这样在墨学研究史上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学者，也认为这一部分“于哲学没什么关系”，可以“缓读”。这种认识在学术界造成极大的负面影

响:在日益增加的墨学研究论著中,真正的相关专题研究极少,专著仅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而且还是几十年以前的成果),而真正的专篇研究论文近百年不足十篇。

相形之下国外学者则投入了更多精力,并取得了更多明显的突破: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即有渡边卓等学者对这一课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发表了《关于墨子的城邑守御》等论著,后有田中淡等学者的更深入细致研究。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教授叶山为了研究墨家攻守城技术,还专程到许多相关的考古发现遗址做实地调查,并参阅相关资料,写出了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论著。不过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

近年来随着一些相关文物的发现,目光敏锐的学者据此作出了重要的考证与研究。著名学者陈直、李学勤诸先生相继发表了一些具有重大突破性的成果。如陈直先生的《居延汉简与〈墨子·备城门〉诸篇》,李学勤先生的《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等。本书即利用上述成果与出土文物以及后世相关资料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墨子·备城门》诸篇著者与时代考

《墨子》一书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为“周墨翟著”，但当代多数学者认为其书内容丰富复杂，涉及事件有许多并非墨子之时，不可能为墨子一人所撰，尤其是《墨子》的《备城门》诸篇更非墨子时代之作。但长期以来因《墨子》几乎无人问津，故其著者问题亦无人考究。清代随着墨学渐兴，苏时学、孙诒让诸学者始有论述：苏时学首创《备城门》作者为秦人说，孙诒让则推为“禽滑厘所受守城之法”，但并无深考。自20世纪40年代朱希祖提出“《备城门》以下二十余篇”“皆汉人伪托”之后，有关问题引起了学术界争论，直到当代仍有学者认为《备城门》诸篇非先秦著作（或部分为汉人作品）。然而，自从发现相关出土文献之后，陈直、李学勤诸先生皆据此推定为墨家后学善守御者之作，但然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考辨。

朱希祖认为《墨子》城守诸篇为汉人伪书的依据有四条：
1. 《备城门》以下，今存之十一篇中，多汉代官名；
2. 《备城门》以下有汉代刑法制度；
3. 《备城门》诸篇多袭战国末及秦汉诸子；
4. 《备城门》诸篇多言铁器、铁名，与墨子时代不符（见1929年

《清华周刊》三十卷,第九期)。然四条理由皆难以成立。

朱希祖之说首先犯了一个未曾明言的前提错误,即将《墨子》全书作者归于墨子,时代预设为墨子之时,此一论点虽仍有某些当代学者认同,但多数人并不赞同(此不赘述),仅看苏时学之说即可:《号令》篇孙诒让注引苏时学云:“墨子当春秋后,其时海内诸国自楚越外,无称王者,故《迎敌祠》篇言:‘公誓太庙,可证其为当时之言。若《号令》篇所言令、丞、尉、五大夫、关内侯、公乘,皆秦时官,其号令亦秦时法,而篇首称王,更非战国以前人语,此盖出于商鞅辈所为,而世之为墨子学者取以益其书也。倘以为墨子之言,则误矣。”孙按:苏说未塙,令、丞、尉、三老、五大夫等制并在商鞅前。”这种说法的合理之处是注意到了《备城门》诸篇与墨子时代的证印关系,但这一说法虽然看到了墨子城守与秦时法相近处,但却很难站住脚:商鞅于卫不见用,于秦大受重用,并因两次推行变法而受封,其末则因开罪秦惠王而被车裂,故既无必要亦无可能撰著城守诸篇。文中所载刑赏诸法与秦法一致者,盖因秦国的墨者此时已完全融入秦国的政治生活,而且备受尊重(观秦惠王优待腹䷍事可证),故其行秦法也就毫不奇怪了。故孙诒让即以苏说为非。

朱希祖既未顾及苏时学之言的合理因素,其所举四条理由亦难立足。先看朱希祖第一条理由。其所举汉代官名出处原文为:《备城门》“召三老在葆宫中者,与计事”,同篇“城上四隅童异,高五尺,四尉舍焉”。实则二者所言之职官早在先秦时代即已存在。《史记》载西门豹治邺事即已言及“三老”,而“尉”之职更见于多种记载:《左传·闵公二年》载“羊舌大夫为尉”,《成公十八年》载“立国尉以摄之”,《襄公十九年》载有“军尉、舆尉”,《襄公二十一年》:“将归死于尉氏。”(《左传》记有“尉”之

职尚有多处,此不俱引。)《商君书·境内》:“其具有四尉。”孙诒让《墨子间诂》谓“《北堂书钞·职官部》引韦昭《辨释名》云:‘廷尉、郡尉、尉,皆古官也。言尉尉人心也。凡掌贼及司察之官皆曰尉’。而其他如‘曹’等亦汉代之前即有(详见相关部分考证)。”

另一条理由:《墨子》抄袭战国末及汉代诸子,此亦难成立。朱希祖举例如下:言《备城门》抄《管子》,其文为“凡守城之法,厚以高,壕池深以广,楼榭修,守备缮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众以选,吏民和,大臣有功劳于上者多,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不然,父母坟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泽之饶足利;不然,地形之难攻而易守也;不然,则有深怨于敌而有大功于上;不然则赏明可信而罚严足畏也”。朱希祖以为此“抄《管子·九变》之文而故为颠倒错乱耳”。这种结论恐怕过于轻率。

《管子》一书虽托名管仲,但当代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稷下学宫时期齐国学者所为。今本《管子》为刘向整理编定,据刘向的《管子叙录》,他在整理此书时,共收集到“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所谓“中外书”系指官方所藏与民间所献之书。其中官方所藏为“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民间所献占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内容更杂,包括“太中大夫卜卦书”之类,而今本《九变》篇仅存残缺不多的几句话,以此断定所谓《墨子》抄《管子》本不足据。《墨子》书原文自有逻辑,非“故为颠倒错乱”。吴毓江先生考证即言:“《墨子》之文持与《管子·九变》篇比较,《墨子》文除与《管子》类似者外,字句尚多,文亦通畅。《管子·九变》全篇除与《墨子》类似者外所余不过数句,文势短促,其以剿袭《墨子》而无力续长者。”故应为《管子》作者抄《墨子》,而非《墨子》抄《管子》。况此节文字经多位学者校对后认为应属他

篇简文错入，孙诒让校为《杂守》篇，吴毓江校为《号令》篇（应以孙说为是，详见本书《墨子》文本考校部分）。

所谓抄袭《黄帝兵法》更难服人。朱希祖所指为《迎敌祠》一段文字：“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坛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弩七，七发而止，将服心赤，其牲以狗；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坛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长九尺者九，弩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牲以羊；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长六尺者六，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豕。”

朱希祖此说较之《墨子》抄《管子》更谬：且不言《黄帝兵法》纯为后人伪托，即真为春秋战国之书，此中亦全无本段文字，吴毓江先生即言：“今检《北堂书抄》并无此节文全同之《黄帝兵法》，应请朱先生指明出于《书抄》何卷。若朱先生不能指出，则剿袭一层自难谈到。”

朱希祖又谓《墨子·旗帜》有抄自《尉缭子》者，然考《尉缭子》之书，学者多认为今本为兵家《尉缭子》与杂家《尉缭子》佚篇之合编本，而这两个版本的《尉缭子》，前者大约与孟子同时，孟子生平多数学者推定为公元前385—前304年，兵家《尉缭子》的时间亦大体同。合成之书时代更晚，故合乎逻辑的推论应该是《尉缭子》抄《墨子》而非相反。

再看所谓《墨子》书有铁器之说。无论就历史文献还是出土文物看，朱希祖之说皆难以成立。史料记载先秦时代铁器甚多：《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国

语·齐语》：“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斲，试诸壤木。”《荀子·议兵》亦有“楚人宛鉏铁钁”等不胜枚举。而战国时期已有铁器，更有出土文物为证。

在批驳朱希祖的观点时，吴毓江曾有很好的意见，但称《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四篇为伪书，则其言较为武断，不能不加以辨析。

在吴毓江《墨子校注》附录(二)《〈墨子〉各篇真伪考》中，作者所列依据有六条：

1. 第十五卷《迎敌祠》篇以五行说为骨干，与墨家不信“日者方位”及“五行毋常胜”之说合。

2. 第十五卷中多言严刑峻法，非主张兼爱之墨家所宜有。

3. 第十四卷中多论守械之名物数度，第十五卷则否。

4. 第十五卷中有汉代官制律文，第十四卷则无之。

5. 金钱之重要性见于第十五卷中，《旗帜》篇“金钱有积”，《号令》篇“金钱”凡三见，又曰“直一钱以上”，《杂守》“布帛金钱”。第十四卷则无之。

6. 一人一时所作文字，其所用普通字当无差别，今检两卷，竟有显著相异者。如“其”字在第十四卷多误作“亦”，今校作“亅”；第十五卷“其”字竟无一误作“亦”者。一篇如此，可云偶然，全卷如此，是知其来源之异矣。今唯余自《备城门》篇移入《号令》篇之错简“其”字误作“亦”，此疑原亦作“其”，因其文错入《备城门》篇之时代颇早，传录者见《备城门》篇“其”字皆作“亅”，古本当如此，遂将错简之“其”字亦钞作“亅”，后因同误为“亦”矣。

吴毓江的第一条理由看似十分充足，实则难以服人。墨子不信日者在《明鬼》篇中的确曾有记载，但吴毓江忽视了两个重

要的相关问题:其一,墨子在鬼神天志方面的观点是有明显矛盾的:墨子一方面“明鬼”,但又谓“即使鬼神诚无”,祭鬼神之仪式可以“合欢乡里”,所以也是有意义的。因而墨子并非笃定的非方术神鬼者,而不信“五行毋常胜”则于《墨子》书更无明确证据(《墨经》恰有“五行毋常胜”之说)。其他在“天志”诸问题上,墨子的思想也有明显的逻辑矛盾,此于后学亦有影响。其二,《备城门》诸篇非墨子自著,而系后学所为。墨家后学对于墨子的思想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有的甚至明显对立。在有关日者、五行、鬼神诸问题上,其后学也有相信者,有文献为据:在今存《缠子》、《隋巢子》等后学著作中,言鬼神灵异之文字随处可见,有的甚至成为主要内容。今随手略举二例: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录《隋巢子》佚文:“执无鬼者曰越兰,问隋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圣人?’曰:‘圣也。’(孙诒让注:“疑当作‘贤于圣也’”)。越兰曰:‘治乱由人,何谓鬼神也?’隋巢子曰:‘圣人生于天下,未有所资。鬼神为四时八节,以纪育人,乘云雨润泽,以繁长之,皆鬼神所能也,岂不谓贤于圣人?’”(《缠子》)佚文中:“缠子曰:‘墨家佑鬼神。秦穆有明德,上帝赐之九十年。’”又《田俅子》佚文:“黄帝时,有草生于帝庭阶,若佞臣入朝,则草指之,名曰屈轶。”由此可知,墨家守御一派信日者五行之说并非怪事。何况兵家本有“阴阳”一派,《迎敌祠》有兵阴阳之说。故墨家城守钜子集团信阴阳五行之说亦合逻辑。加之此派墨者多为秦之墨,而秦国日者阴阳之说盛行(今考古发现之简文多秦之《日书》类可证),秦墨受其影响更是顺理成章之事,本不足怪也。

第二条理由亦不足信,“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一城之破千百万生灵涂炭,为保御敌成功,非有严令不可。况墨家亦并非专言严刑峻法,而是赏罚并用,故不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此外，秦之墨者受命于秦之君，其法令固不可有违秦之军令，此亦自然之事耳。

第三条理由，吴毓江言“十四卷中多论守械之名物度数，第十五卷则否”，此亦不成其为理由：前者以攻守城十二器械为中心详论城防战事，后者言军令后勤诸杂事，其所言及之内容本各有所侧重，何以要前后内容完全一致方为“真书”，否则便为伪书？况《墨子》此二卷文字错杂脱误甚多，不可轻言孰是孰非，更不可轻断真伪也，此论墨者尤须小心谨慎处。

第四条理由同第三条，此不再论。

第五条所谓金钱之语亦因内容之需要，此与上述理由大同，亦不繁详辨。

第六条理由似乎有理，然细考之下亦难成立。首先，从竹简、帛书至刻印抄写本，全书抄录者并非一人，不同的抄写者因理解有异，而“其”字抄写随之而异，从而形成不同版本的情况并不奇怪，非即原书“来源之异”（参见本书《〈墨子〉古字考》部分）。又吴毓江称“余自《备城门》篇移入《号令》篇之错简‘其’字误作‘丌’，此疑原亦作‘其’，因其错入《备城门》篇之时代颇早，传录者见《备城门》篇‘其’字皆作‘丌’（原注‘古本当如此’），遂将错简之‘其’亦抄作‘丌’，后因同误为‘丌’矣。”然此亦仅“疑”而已，作为证据尚不能服人。据著名墨学专家栾调甫先生考证，“《备城门》篇其中文字异同，多与道藏本合，……唯其古字古言，多为书贾所改，如‘丌’本古‘其’字，书贾不识此字，皆改为‘亦’字，可笑之甚。”道藏本、嘉靖癸丑本，“丌”字已作“亦”，故其文字之演变舛误难见真相。除非有地下出土文物出现，或有版本校勘上的真凭实据，否则此“疑”终难论定。轻下断语亦墨子研究者所当忌矣。

除此之外,吴毓江的推论还有另一条理由,即以原书是否有称“子墨子”为判断真伪之标准:“综观《墨子》各篇,有‘子墨子’之称者未必真,而无‘子墨子’之称者则必伪。持此以概全书,自谓可无大过。今本真书中无‘子墨子’之称者,仅《非攻上》、《备水》、《备突》三篇。《备水》篇仅百余字,《备突》篇仅数十字,其为残脱显而易见。《非攻上》篇之有脱文,曹耀湘早于数十年前论及,并校移《非攻中》篇‘子墨子言曰云云’数十字于上篇。故三篇虽今本无‘子墨子’之称,亦可推知其原本之有也。又此所谓伪者。”

然此说亦为武断之词。且吴毓江既以此独断论做判断标准,又以所谓错简脱误辨“今本无‘子墨子’之称,亦可推知其原本之有也”,并以此判《迎敌祠》四篇为“伪者”,欲以此轻率之说服人亦难矣。

除上述二家之说外,尚有商鞅之流为著者说,此说之代表即为清代学者苏时学。他的《墨子刊误》是对《墨子》城守诸篇最早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著作,其书对《备城门》诸篇做了认真的校对工作,并纠正了原文的不少错字。但苏时学关于此诸篇为商鞅辈所做的观点也是很难站住脚的。商鞅于卫不见用,于秦则大受秦王尊崇,并因两次实行变法强秦而受重赏,但其末则因开罪秦王而被车裂,故其既无必要亦无可能撰作《墨子》的《备城门》诸篇。

关于《备城门》诸篇的作者与时代,笔者的观点是:城守诸篇的作者为墨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尤其是秦国的墨者,而其时代则应为战国中后期。这一结论不仅有史料依据,同时更为出土文献所证实。在当代学者中尤以陈直、李学勤先生的论证最为充分有力。